

海峡两岸文化建设研究

【主持人语】严歌苓的创作成就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确认,本期刊登《严歌苓移民小说中异国形象及其成因》一文,就是对严歌苓文学创作研究的一个倡导。该文具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作家严歌苓的跨国移民小说,特别是在美国的移民者生活,认识她所塑造的自立自强的中国移民形象和美国人身中的“救世主”形象。论者努力思考和力求揭示的在于两类形象的各自文化内涵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沟通,在论及两类人物形象的成因时,也重在认识中西文化本身的差异和小说人物对于异国文化认识的尊重或者偏误。二是论者认为严歌苓移民小说的异国形象有两个突出系列,即:中国移民中的自立自强形象,是中国人在“异国”;在“异国”的充任“救世主”的美国人形象,是在“异国”的美国人。这两个文学形象系列都是鲜活、深刻的,既为读者提供了生动的审美对象,还蕴藏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不可否认,研究焦点的集中,可以带来论说的深入与便利,但是也为其他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该文论及的两类人物形象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同时,严歌苓在移民小说创作之后的《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等长篇小说,也更为精彩和丰厚,需要评论界的积极关注、全面总结。希望通过对严歌苓文学创作的认知和讨论,感受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了解时代和社会在文学中的审美形象与丰富意义。

(集美大学 姚楠)

严歌苓移民小说中异国形象及其成因

陈学芬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涉外小说表现了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涉及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小说塑造了自立自强的中国移民,解构了美国自塑的“救世主”形象,反映了不同的异国形象。形成这样的异国形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二是作家的创作个性。

【关键词】严歌苓;移民小说;异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I 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13)04-12-06

学术界对严歌苓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很多,但较缺乏异国形象的探讨,尤其是中国移民形象与美国形象的对比。这里主要选取她书写中

国人移民美国的小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探讨她笔下的异国形象的特征,并分析异国形象的形成原因。

【收稿日期】2013-06-12

【修回日期】2013-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12BWW006)

【作者简介】陈学芬(1980—),女,河南商丘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一、异国形象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中,异国形象相对于主体而言是一种他者形象,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形象是对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的想象,它折射了主体的欲望。在美国华文文学中,异国形象又有一定的特殊性。作家是中国人,在中国接受文化教育,成年后移居美国,身上有着深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烙印。对这些人来说,中国是自我,而美国是他者;中国形象是自我民族形象,而美国形象是异国形象。但中国形象也是想象的,充满主观性和变异性,因人而异;当移民日久,移民们也逐渐接受美国文化,成了美国人,隔着巨大的时空,回望故国,记忆中的中国开始模糊、变形。作家参照美国形象,突出中美的相异性,重新建构的中国形象因时空而变。因此,中国形象也有了异国形象的成分。孟华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代序》中说,华人“自塑形象”——中国作家塑造出来的中国人形象,以异国读者为受众,或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具有超越国界、文化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异国形象,至少可被视为具有“异国因素”的形象,应该纳入形象学的研究范畴。^[1]海外华文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自塑形象”。美国华文文学移民题材的小说以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作为描写对象,具有超国界、跨文化的意义,这些中国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异国形象,至少可被视为具有“异国因素”的形象。莫言也说:“新的离散文学中的母国与家园,应该是作者的艺术创造,与作者真实的父母之邦有着巨大的差别。”^[2]而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美国形象则是无可争议的异国形象。美国华文文学是华人移民作家用汉语在中国大陆本土之外的美国语境和文化景观下完成的,不可避免地受到异域民族语境和异质文化的影响,不同于在中国大陆本土创作的中国文学,既融合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美国文化传统,又同时表现了作家心理结构中的中华意识、中华情结以及美国的社会生活景观、人文景观及自然景观。总之,对移民作家来说,中国形象和美国形象都是想象的,都有变异性,都不同程度地是异国形象。以下分别讨论中国形象

和美国形象。

(一) 自立自强的中国移民

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中国移民各式各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自立自强,自尊自重,热爱自由逍遥,不受白人控制。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里从黑人精神病患者的精神世界来透视殖民统治下的种族问题,黑人渴望变白,通过与白人的恋爱、婚姻让自己变白。“因为黑人姑娘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所以她渴望使自己为白人世界接纳”。^[3]可严歌苓笔下的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华人女子,本可以通过与白人的跨种族婚姻变“白”,却选择了弃白人男子而去,为什么呢?

在《扶桑》中,面对克里斯的自我牺牲式的爱的拯救,身为娼妓的扶桑选择的是逍遥,无牵无挂的自由。也许她认为,隔着种族、文化和阶级的天河,他们在一起只能是悲剧。爱情只会让他们活得很痛苦,她要的自由是克里斯给不了的。她在受难中享受自由。经历过苦难,她就像浴火的凤凰一样重生。受难自有它的高贵和圣洁。她充满神性,似乎超然于世,对一切都无可无不可,无意识地奉行老庄哲学,随遇而安,无为无不为。她的大智若愚、温柔和顺让她绝境逢生,坚强地活到老,是三千中国妓女中活得最长的一个。扶桑以女性的身体承受历史强加的一切,像大地一样,是最污秽的也是最圣洁的。她有别于传统的贞洁的、刚烈的妇女形象,然而却是坚忍的,就像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母亲一样,虽备受蹂躏,却坚强不屈,如凤凰涅槃般获得新生。她很少说话,默默承受一切。她的沉默除了自身性格原因外,也是美国排华的结果,当时的华人移民普遍处于失语状态。相对于白人对华人女子的拯救,华人男子大勇对华人女子扶桑剥削、压榨,她既是摇钱树,又是性奴。大勇同时也是华人英雄,让洋人闻风丧胆,是唐人街的恶霸兼保护神。他在排华浪潮中逐渐改变,兽性慢慢消退,人性逐渐升华。他甚至无条件地释放女奴,准备把扶桑也嫁出去。但他最终为维护扶桑的尊严,杀了牛肉商而被判死刑。他颠覆了美国套话中的华人男子的沉默胆怯,软弱可欺,对白人唯唯诺诺的猥琐形象,刷新了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华人形象。这篇小说与美国白人文

学形成对话。

扶桑是充满神奇色彩的早期华人移民女子,新移民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两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精神上呈现了一脉相承的特质。严歌苓小说中的大量新移民女性在异域打拼,自立自强,追求自由和爱情,拒绝白人爱的救赎。《无出路咖啡馆》、《栗色头发》、《人寰》中的女留学生们在美国很贫困,但自力更生,不愿接受白人的拯救。

《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女留学生曾是中国的一名军官,到美国后与美国外交官安德烈邂逅,很快订了婚。为此遭到FBI和国家安全局没完没了的审讯,导致她失去工作,交不起房租,拆东墙补西墙,在牧师夫妇发起的募捐现场讲中国孩子的苦难童年,惹人怜悯,甚至要去卖卵子,被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捐客敲诈、威胁,终于都挺过来的她却在得知安德烈为她放弃了心爱的外交官生涯时,离他而去。安德烈爱的救赎遭到了拒绝,因为中国女留学生也许根本就不爱他,也不需要他的拯救。她爱的是中国人里昂。因为安德烈能给她稳定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她迟迟不肯说分手。但她承受不了安德烈为她所做的巨大的牺牲,她觉得自己背叛了他,精神上出了轨。而且她觉察到他的救赎式的爱情无法让她们平等交往。牧师夫妇为她在教会里募捐,可以解决她的经济危机,但她不愿一而再、再而三地贩卖情感膏药,讲述中国孩子的苦难。因为她明白她的故事是自我东方主义,以满足白人的东方主义期待,换取怜悯和捐助。她的良知和民族自尊让她拒绝继续妖魔化中国,以取悦于美国人。

短篇小说《栗色头发》与《无出路咖啡馆》有些相似,赤贫的中国女留学生不愿接受爱她的有着栗色头发的美国人的帮助,只因为他常在她面前大骂中国人。她无家可归,也不愿住进他的华夏,不愿回应登报寻找她的栗色头发。她认为只有等到两人能真正相互理解的时候,她才能回应。《人寰》中的女留学生孤身一人在美国,需要稳定的工作,需要爱人,但为了避免重蹈父亲与恩人的怪圈,摆脱恩典,以及由此而来的讹诈、奴役。她忍痛离开了能给她工作和家的白人,她要做个正常人,再也不要像父亲那样,充满奴性、廉价的感恩之心,一辈子摆脱不了恩人

的阴影。

《橙血》中的阿贤为了摆脱主人、恩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为反抗种族歧视、殖民统治,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典型。阿贤的无力的笑容,使它原本温良的一双小眼睛成了两条细缝,构成玛丽和其他白种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中国容貌。阿贤的东方形象是玛丽在东方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一手打造的,阿贤只能无奈地定格在这个形象上。玛丽的客人们像看戏中人一样地瞪眼看阿贤,玛丽更是召他来挥他去,炫耀他的古老、优雅和谦顺。为了不再做固定的景物,阿贤装成摔伤了腿,躲在房里不出来。阿贤对主人的第一次反抗,虽然消极,却透露了他长期的苦闷。他也希望与时俱进,做个现代人,而不愿定格为白人心目中的古老的化石般的东方人。他要摆脱被看、被他者化的命运。阿贤的第二次反抗是因为玛丽对来买橙子的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他久被压制的民族自尊让他再次反抗女主人。美国人一再强化他的古老的中国人形象,中国同胞一再质疑、否定他的中国人身份,都给他带来精神上的伤害,让他渴望摆脱专制的女主人,回到本族人中间去。中国女人的出现提供了他重获自由的契机。阿贤决定放弃财产继承权,剪掉辫子离开,和中国女人一起经营她的橙园。不肯放手的女主人让人杀了他。他为了爱情和自由,为了人的尊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移民作家关注移民生活,她小说中的移民远离故土,遭遇美国白人文化的冲击,但坚守中华文化,对白人、对美国既不狂热,也不厌恶,而是持亲善态度,平等交往。这反映了她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关系的思考。饶芃子曾说:“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是处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一意识有时并不那么强烈。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在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想象,是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当中凝结有作者的情感和思想。”^[4]

(二) 虚幻的美国“救世主”形象

严歌苓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美国人,其中“救世主”形象系列最为引人注目,如《扶桑》里的克里斯、拯救会,《无出路咖啡馆》里的安德烈、牧师夫妇和教会里的捐助中国女留学生的

普通美国人等，《栗色头发》中的有着栗色头发的富裕美国人，《人寰》中的舒茨，《橙血》中的血腥玛丽等。这些“拯救者”，有生活在美国排华时期的，也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多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不错的收入，对东方人有着拯救情结，热衷于扮演东方人的救世主。

《扶桑》中的克里斯把自己想象成神话中的骑侠，去管教、营救一个美丽的东方女奴。克里斯对东方女子充满好奇，在他看来，畸形的三寸金莲，充满刺绣的大红绸缎，喝茶、嗑瓜子的姿态都充满东方情调，扶桑就像一尊神像般的东方女人，浓极的异国情调第一次引起他对异性的梦想。病中的扶桑即将被活埋，柔弱少年克里斯叫来拯救会的人救了她。拯救会是白人设立的专门拯救被拐卖的华人女孩的，由修女主持的机构。拯救会的人一边拯救中国女孩，一边侮辱她们。这让扶桑宁愿跟着大勇去做妓女，也不愿呆在拯救会忍受种族歧视和精神折磨。克里斯眼睁睁地看着她被铁链拴走了。他长大后宣布要娶扶桑为妻，带她到允许跨种族通婚的蒙大拿去。他甘愿牺牲自己，去娶一个妓女，为他的民族曾经对华人犯下的罪过赎罪。他想以自我牺牲架起种族鸿沟的桥梁，向狭隘的容不得异族的白人孔和黄皮肤表示，不同的种族是可以联姻的，相亲相爱的。但扶桑拒绝了，拯救女奴的骑士梦最终也没有实现。

《无出路咖啡馆》里的安德烈、牧师夫妇甚至FBI的便衣侦探都有救世主情结，他们想通过婚姻、募捐甚至收养第三世界的儿童等各种方式来拯救“顺水漂来的孩子”。《圣经》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曾是顺水漂来的孩子。埃及法老下令杀死新出生的犹太男孩。摩西是犹太人，出生后，母亲为保其性命“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埃及公主发现了，带回宫中，把他当儿子抚养，取名摩西。摩西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从水里捞上来。安德烈和牧师夫妇觉得中国女留学生从中国漂到美国，无依无靠，举步维艰，处于困境中，他们有义务营救她。安德烈为了她还失去了心爱的外交官工作。但由于拯救对象的不配合而使得拯救以失败

告终。

短篇小说《栗色头发》中的瞧不起中国人的栗色头发美国人爱上中国女留学生，试图帮助她摆脱困境，被拒绝。长篇小说《人寰》里的白人系主任舒茨起初骚扰中国女留学生，后来两人谈起恋爱来。舒茨手里握有讲师的空缺，但要等她全面接受了他后才肯给她。中国女留学生不愿受他恩惠，离他而去。

《橙血》中的血腥玛丽是拯救者、殖民者，也是毁灭者。这篇小说的题目和玛丽的名字都很有深意，血橙让人联想到鲜血，玛丽吃血橙的样子，让人想到喝人血的血腥玛丽。玛丽曾对阿贤有恩，是他的教母，但把他当作所有物、奴隶，死死不肯放手。阿贤做了女庄园主30年的奴隶，下定决心离开，却只有死路一条。在西方的恐怖传说中，有不同的血腥玛丽的版本。原型为玛丽一世，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曾处决了差不多300个反对者，而被称为“血腥玛丽”（Bloody Mary）。传说中的另一位血腥玛丽是艳倾一时的李·克斯特伯爵夫人，用纯洁少女的鲜血沐浴，以保持美丽的容颜。还有其他的血腥玛丽形象，都与血腥杀戮、精神变态有关。严歌苓借用了这个文学典型，又改造了血腥玛丽的形象，以表达她的异族交往中反殖民、争自由的新主题。伴随着帝国的殖民扩张，殖民主义成为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不仅到国外殖民，在国内也有殖民，对有色人种、弱势人群实行内部殖民。

种族或少数族裔研究一直是后殖民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而“内部殖民”作为少数族裔研究中的新模式是近年来才兴起的。“内部殖民”这个术语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特别的情形：“在国内或内部殖民地中，欧洲白人、英国殖民者以及他们的后裔对本土原住民、墨西哥人、从非洲贩卖来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进行控制和支配。”美国对境内的黑人、印第安人也是内部殖民。^[5]那么对作为少数族裔的黄种移民呢？

白人玛丽和中国移民阿贤之间就构成了内部殖民关系。以玛丽为主的白人致力于对黄种人阿贤的他者化建构，而阿贤一再反抗，当他为了自由与女主人彻底决裂时，竟然被谋杀了。阿贤为离开教母式的玛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玛丽为什么要如此极端呢？对阿贤来说，玛丽起初是以教

母的身份出现的。也许对于玛丽来说,阿贤不仅是她亲爱的孩子,不仅是她的奴仆,更是她精神上的恋人,她想控制他、占有他,一旦他要离开,她的嫉妒心发作,甚至到毁灭爱人的地步。她的身体残废,精神上也是,有着疯狂的嗜血本能,是个有着东方主义的自恋、自负、专制、残忍的美国女庄园主。她对阿贤实行内部殖民,对他的爱充满种族歧视和占有,她有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她的残疾更让她精神上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她是殖民者的塑像,对被殖民者拯救、压制和奴役,遇到反抗就消灭被殖民者,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她是殖民主义者的化身。

二、异国形象的成因

严歌苓关于异国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她对“自我”与“他者”的看法。笔者认为形成这样的异国形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 中西文化差异

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形象虽然依然是游子,但少了很多消极情绪,多是乐观、进取、自立自强的新移民形象,而部分美国人则有着东方主义和拯救情结。造成这些不同的形象的原因首先是中西文化的差异。

华人在出国前深受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到美国后精神上依然是中国人。貌似柔弱,实则刚强,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骨子里是中国老庄思想中的逍遥自在的观念。扶桑的大智若愚、逍遥自在,中国女留学生的自尊自立自强,都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她们想要的态度是亲善,能够实现双向交流,通过互相了解和承认,平等对话。严歌苓笔下的中国移民对美国这个他者持亲善的态度,希望能与美国人平等交往,相互了解。

而小说中的一些美国白人依仗强大的国力,先进的文明,更由于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和殖民心态,让他们相信拯救的力量,故以救世主的姿态自居,总想拯救东方的弱女子,而把华人男子看成是女性化的。除了深受基督教中的神性拯救精神的影响外,白人还受西方骑士文化的影响。由于骑士制度的确立、骑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产生了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准则。

他们突破基督教的出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要求现世享乐,向往世俗的爱情,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骑士荣誉和侠义的扶弱除强的骑士精神以及温雅知礼的骑士风度等。《扶桑》中的克里斯深受骑士文化的影响。“他仍想象自己是神话中的骑侠,有个遥远国度的美丽女奴需要他去管教。他得以剑斩断囿她于其中的罪恶。他对于她的苦苦寻找,他营救她的愿望使他一次次投入声讨中国人的集会”。^[6]

除了宗教信仰、骑士文化的影响外,美国人还有东方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需要他们大发慈悲来拯救顺水漂来的孩子。在拯救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种族身份优越感。身为发达国家的公民,身为白种人,与优越的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被看成是落后的,异国被看成是野蛮的,面对赤贫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留学生或孤儿,大发慈悲,英雄救美,英雄救孤,从而为平庸生活带来超越,充满壮烈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息。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殖民思想的延续,显示了对他者的贬斥,对自我的抬高,与优越的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被看成是落后的,对异国充满憎恶。

(二) 作家的创作个性

作家的创作个性决定了形象的特征,而创作个性的形成与时代背景和文化构成有密切的关系。新中国建立后,与美国关系紧张,二三十年间对美国关闭了大门。1978年12月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中美建交,许多大陆人奔赴美国,国内文学界把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中国大陆移居到其他国家、目前已加入所在国国籍的人群称为新移民。与老一代华人移民相比,新移民中知识分子比例明显增大,甚至可以说主体就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拥有较高的学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后,多数都能跻身中产阶级,物质生活较为优裕,有相当的地位和尊严。其中一部分人热衷于写作,成为大陆新移民作家。他们“在东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语境中思考并创作,既反思东方文化传统,也不忘打量西方文化;既关注海外华裔的生存与抗争,也关心在种族、文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个人的追求和欲望。”^[7]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美国社会,对外来移

民越来越宽容，种族歧视进一步减轻，美国日益改善的种族关系为新一代移民提供了较为宽容和自由的生存空间。华人与美国人互动增加，双方也越来越了解，更容易融合。时代、国家的氛围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严歌苓1989年访美，开始书写移民生活。中美形象的形成与严歌苓的生活经历和西方文学文化修养也有很大关系。她的很多小说有她自身生活的影子，如小说中的失眠者，很大一部分是她自身的投影，《人寰》中的父亲与贺叔叔的关系，父母的婚姻等都以现实为基础。《无出路咖啡馆》是以她与外交官丈夫在FBI监视下的婚姻为蓝本的。那些孤独的移民是她精神上的孤独的投射，有她对异域生活的切身感受和思索。她在美国留学、定居接触了很多西方文学文化，如西方人的骑士观念、基督教文化、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从西方流行的骑士文化，到对《圣经》中顺水漂来的孩子的典故的运用方面及血腥玛丽的形象的重塑，可以看出，严歌苓深谙西方文化，尤其是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文化、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等。这些与中国老庄的逍遥之道是截然不同的，因而造成异族男女人物间的情感冲突和悲剧结局。严歌苓游走于中美之间，对中西文化都很熟悉，熟练运用中西

方文学、文化遗产，这为她塑造真实可信、立体丰满的“美国人”形象打下了基础，中西文化一起构成了她小说别样的风格。

[参考文献]

- [1]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5.
- [2] 莫言. 离散与文学 [DB/OL]. (2013-05-09) [2013-06-15]. <http://news.gznu.edu.cn/info/1013/4464.htm>.
- [3] 法农. 黑皮肤·白面具[M]. 万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43.
- [4] 饶芃子. 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2000(1): 1-5.
- [5] 蔡云. 美国“内部殖民”进程中的“他者”——后殖民语境下海明威小说中的印第安人[J]. 名作欣赏, 2011(6): 62-64; 83.
- [6] 严歌苓. 扶桑[M] // 严歌苓文集.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47.
- [7] 郭群.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论查建英的《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5): 461-465.

On the Exotic Image in Yan Geling's Immigrant Novels and Its Causes

CHEN Xue-fe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s by Yan Geling, a new immigrant writer, show the life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ng to Americans of all kinds. The novels have created self-made Chinese immigrants, deconstructed the “savior” image claimed by America itself, and reflected a different exotic image. There are two cau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exotic imag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writer's writing style.

Key words: Yan Geling; immigrant novels; exotic image

(责任编辑 林 芎)